

周恩来同志与国统区抗战文艺

安 子 昂

文艺是民族解放事业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充分发挥文艺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尽管任务繁重，但他自始至终关心着文艺，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国统区文艺运动，为发展抗战文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周恩来同志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贯穿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全过程和它的各个方面。系统地学习、研究周恩来同志有关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意见、指示，对深入了解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就我们学习的一点体会，谈谈我们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迅速地、及时地把文艺工作全面转入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轨道，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这首先是促成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把一切愿意或赞成抗日的文艺家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文艺统一战线，是文艺工作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

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任务的“五四”新文学，本来就与民族解放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危机以后，“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团结御侮的重大意义愈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所认识。所以，当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已经燃起，组织起来“共同努力于抗战文艺”，更成了文艺工作者的迫切愿望。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文化中心向内地转移的文艺工作者，普遍怀着“到大后方开辟文艺”的心愿，纷纷集中到了当时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建立文艺界全国性抗敌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同志十分宝贵文艺工作者的抗战热情，他立即把组织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任务交给了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同时指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个团体应“包括各方面力量”，“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①。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建提供了思想指导，它一方面强调了应当“包括各方面力量”，有助于消除部份人不愿与国民党文人搞统一战线

的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强调了“领导权决不能落在国民党手里”，警惕了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曾经有所表现的只讲“联合”，忽视“主体”的糊涂倾向。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当时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包括部份领导同志，对这一道理却还不完全懂得，周恩来同志强调文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为挫败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争夺文艺工作者的阴谋，在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还多次就文艺协会机构的设置和人选等问题与党内外文艺人士交换了意见，使文艺界抗敌协会能真正成为文艺界团结抗战的旗帜。

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正式成立。周恩来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当选为“文协”名誉理事。“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比之于“五四”以来各革命历史阶段的文艺统一战线，它更加广泛。

“文协”中既有党的文艺工作者，也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艺家，还有国民党文人，甚至文化官僚。它实现了鲁迅所期望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鸳鸯蝴蝶都无妨”^②的抗日大团结。周恩来同志指出：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这是周恩来同志培育的结果，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中，政治部第三厅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作为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一个职能部门，负责宣传工作。蒋介石取消政训处、恢复政治部、设立第三厅，意在收揽人心，宣传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但经过周恩来同志的重大努力，却把它建成为党领导下的、“可以为全面抗战作许多事情”的统一战线机构。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当时国统区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出色地发挥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第三厅除负责对内对外的抗日宣传外，还担负着组织抗战文艺活动的任务。它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和放映了不少抗战艺术影片；它组织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宣传队，坚持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 and 国民党军队里；而孩子剧团，则是大后方戏剧舞台上的一支活跃的生力军。不仅如此，它还配合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开展工作，有力地促进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第三厅既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堡垒，也是国统区抗战文艺的堡垒。

文艺统一战线的范围愈广泛，无产阶级的领导责任愈重。为确保和实现无产阶级在文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周恩来同志要求我党在国统区的有关组织——如南方局文委、八路军办事处文艺小组，加强对文艺现状的调查研究，密切与文艺界人士的联系，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对党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同志也要求他们与党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周恩来同志还特别重视发挥左翼和

爱国民主作家的中坚、骨干作用。党的文艺工作者甚少，从事抗战文艺活动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倾向革命，愿意跟着党走。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顽固派所必需的。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周恩来同志决定请老舍以“总务部”主任名义主持“文协”全面工作是匠心独具的。老舍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为坚定的“抗战派”，他撇下妻子儿女，只身从济南流亡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他接受党的领导，富于正义感，热心公务，在文艺界也有较高声望；党不便讲的话，他好讲，党不便做的事，他好做。文艺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后，老舍的实际行动表明，他没有辜负党的信赖，不愧为一个坚定的“愿听将令”的“抗战派”。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尊敬，被推选为历届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文协”在他的主持下，始终掌握在党领导下的进步文艺人士手中。

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抗战文艺运动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保证。

周恩来同志在“文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文艺工作中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抗战文艺运动作为人民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周恩来同志指出，它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同时肩负着“在抗战过程中建设今代中国的重任”。他希望作家多反映抗战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敌人的残暴，多反映后方民众动员的热烈，以激发全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为此，他也希望文艺工作者奔赴战场，深入内地，更多接触人民的生活，在生活中、斗争中获得创作泉源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使抗战文艺成为民族的呼声。民族解放战争是艰苦的，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有困难也有曲折，周恩来同志因此激励文艺工作者要“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在创作上，周恩来同志反对匍匐在艰苦的现实面前，不能“显示出伟大的奋斗前途”的创作，他要求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即对未来的确信统一起来。他强调，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大众，深入人心”，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大众化，通俗化”^⑤。周恩来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这一系列意见，为抗战文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新华日报》根据周恩来同志在“文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社论也指出，抗战文艺是为大众的，“因此，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生活于大众之中”，“接触到血赤淋漓的生活现实，只有向这现实中深入进去，才有民族的出路也是文艺的出路”。

正是根据这些启示，“文协”在成立大会上响亮地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化为作家们共同的、自觉的行动。在“下乡”、“入伍”两个口号鼓舞下，“作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于是，大量的报告文学、街头剧、朗诵诗、利用民间固有的旧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产生了，这些作品虽未必都好，“可是都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程度上收了激励人民的效果”。

抗战激发了人民群众巨大的爱国热情和深厚的艺术创造力。在周恩来同志的倡导

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群众文艺活动也蓬勃兴起。1938年4月，由周恩来同志指导、第三厅主持、“文协”等单位参加的武汉扩大宣传周，既是一次政治大动员，也是一次文艺大动员。数千人参加歌咏游行、画灯火炬游行，十几家戏院上演话剧和各种戏曲，三十多个话剧团和戏剧宣传队分布到工厂、街头、江岸巡回演出，五家电影院全部上映抗战电影并组织流动放映队深入农村放映。真正做到了周恩来同志所要求的，“艺术宣传要更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文艺与群众的联系，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达到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密切程度。之后，业余歌咏队、演出团遍及武汉三镇，文艺通俗化运动、朗诵诗运动相继展开，掀起了群众文艺活动高潮。

戏曲是一支重要的艺术力量，它不仅拥有众多的戏曲艺人，而且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厅成立后，周恩来同志特别提出要重视对地方戏曲艺人的团结和教育，并指定在戏剧科内增设专职人员分管戏曲工作。为提高戏曲艺人对抗战的认识和艺术水平，第三厅一面派人帮助他们排演新编的抗战戏及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传统剧目；一面举办包括各剧种人员在内的“抗战歌剧演员讲习班”，由郭沫若担任班主任。演员们在讲习班通过近三个月的学习，普遍提高了觉悟，坚决表示要“为民族存正气，与抗战共始终”。武汉撤退前夕，他们热烈响应周恩来同志到大后方去的号召，上千名戏曲演员转移到了大后方，担负起抗日宣传工作。

上述情况表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文艺工作从组织到思想已转上了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轨道，并取得了初步的战果。

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总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在文化思想领域，他们推行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核心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在肆意宣扬反共反人民的伪三民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扼杀进步文化的措施。1938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决定设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及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对抗战文化、文艺实行严格控制；以后又陆续制定了各种“送审须知”和“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依据这些反动法令，他们大肆查禁书刊，封闭书店。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1年6月，查禁书刊96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16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1943年查禁书刊500余种。与此同时，为争夺文化、文艺界的领导权，1941年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和各省市文运分会，1942年通过它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发表了《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1943年又公布了《文化运动纲领》。“文运会”的建立，政策、纲领的制定，标志着国民党文化专制从组织到理论的体系化和“法典化”。国民党政治上的独裁，文化上的专制，把整个大后方变成了一座庞大的集中营，进步作家的处境极为艰难。正如茅盾所说的，“思有所写作而

动辄触犯禁忌，思欲深入社会以充实生活，则障壁重重，处处遇鬼打墙”^④。

为推动国统区文艺运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原则，击退妥协、分裂、倒退逆流，周恩来同志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包括反革命文艺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文艺战线上作了大量工作。他在亲自为《新华日报》撰写的大量社论、专论和代论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大义凛然地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罪行和谬论，向广大群众指出了团结抗战的有利因素和光明前途，重申了我党誓与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不达到驱日寇出境，决不罢休”的决心。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这些文章给了国统区人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指示党的文艺工作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诸如举办学术讨论会、文艺报告会，组织中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等，密切文艺界的联系，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又把党的报刊、文章、书籍秘密地送到进步文化、文艺人士手中，让他们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在纪念活动中，周恩来同志特别重视鲁迅纪念。这是自然的；鲁迅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在人民中特别是文化界享有崇高威望，学习鲁迅精神在抗战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1938年10月，周恩来同志就号召人们学习鲁迅，作“疾风”中的“劲草”，把抗战坚持到底。1940年10月，他在“文协”组织的纪念会上总结了鲁迅战斗一生的四个特点：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嫉恶如仇。在国民党反动派用尽威胁利诱、造谣诬蔑手段分裂文艺统一战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提出这四个特点，实质上是在教育大家要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敌友；要严于律己，不在反动派的威胁利诱面前动摇、屈服；要爱护关心朋友，相信朋友，搞好同志间的团结；要对敌人狠，敢于起来斗争。1941年是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周恩来同志同他商议后，决定展开大规模庆祝，藉以发动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法西斯统治下的低沉局面，鼓励进步文化人向郭沫若学习，更好地为革命作出贡献。周恩来同志指定阳翰笙为南方局起草电文，通知成都、桂林、香港等地党组织配合行动，并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内成立以阳翰笙、冯乃超为首的专门机构，负责筹组全国性纪念活动。庆祝大会于11月16日在中苏文协举行，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郭沫若的“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与此同时，还举办了“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展览会”，演出他的历史剧《棠棣之花》。纪念会前后，文化、文艺界人士撰写了七十余篇纪念诗文，掀起了一个学习郭沫若的热潮。这次纪念活动，一扫“皖南事变”后的沉滞空气，振奋了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显示了文艺界团结战斗的力量，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由此开端，祝寿或创作生活纪念便成了国统区文艺界经常开展的一项活动。洪深、老舍、欧阳予倩、王亚平、叶圣陶、茅盾等同志，文艺界都为他们举行过祝寿或创作生活纪念。活动的规模虽有大小，而目的则一：密切文艺界的联系，增强文艺界的团结，“互励共勉，加倍的振起精神来，一同走以后的路”。

为了巩固和扩大文艺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还十分重视同文艺界的友好交往，借以

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要求国统区的我党组织和工作人员“多交友”，“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⑤，通过“交友”，发现和发展进步力量，壮大自己，孤立敌人。1940年1月，李凌、赵沅等人在重庆创办了《新音乐》月刊，深受读者欢迎，周恩来同志立即接见李凌，肯定他们的工作，同时也教育他们“要分出一些力量做音乐界的上层工作”，“人手越多越好，在这方面不能关门”，勉励他们“不要怕幼稚”，“要韧性的战斗”^⑥。周恩来同志与戏剧界接触更多，经常勉励戏剧工作者“把舞台当炮台，把剧场当战场”。1942年初，青年剧社上演曹禺的《北京人》，周恩来同志看后由阳翰笙陪同，接见了演出主持人张骏祥，肯定了演出的严肃认真，使张骏祥和演出的人员受到很大鼓舞。对于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例如坚持抗战而又愿与我党合作的“大兵诗人”冯玉祥，周恩来同志也很注意，当1941年11月冯玉祥六十生日，周恩来同志特地撰写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一文，希望他继续“为民请命”，称赞他“嬉笑怒骂，都成文章”。周恩来同志在把“多交友”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提出时，一再教育党内同志，在交友过程中要严于律己，要多为朋友“设身处地”着想，不能让朋友为难，更不要因我们的疏忽而让朋友引起误解。

为反击反共逆流、保存力量和开拓文艺工作据点，周恩来同志在组织上对左翼文艺力量作了新的部署。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后，他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进步文化界传达“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及时地有计划地安排部分文艺工作者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撤退、转移。例如欧阳山、草明、艾青等同志撤回延安，茅盾、宋之的、章泯、叶以群等大批同志则转移到了香港。为了加强领导，周恩来同志还指示在桂林的夏衍立即赴港，与重庆去港的文艺工作者协同开展工作。其他一些同志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从重庆地区分散开去。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既保存了文艺界的骨干力量，也促进了抗战文艺在低潮中的发展。例如香港文艺界便顿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成了抗战文化、文艺的一个重要据点。这是对国民党嚣张气焰的有力回击。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潘公展在谈到1941年文化界情况时就这样说过：“这一年来文化界人士散布的地域起了一个大的变迁，由于一部分文化界人士对基本国策尚未认识清楚，目标上亦有了距离的差异，所以离去了抗战的腹地，分散到南洋、香港等特殊的区域里。这一举动曾引起一时纷纭的见解。”^⑦大批文化人从“抗战的腹地”离去，在中外人士面前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卖国、专制独裁的咀脸，这不但搞得国民党主管文化的潘公展、张道藩极为狼狈，也使“抗战领袖”蒋介石很不光彩。所以，当太平洋战争中香港陷落，大批文化人在党领导下经东江游击区取道粤北反回内地时，蒋介石特地电告李济深，嘱其促使抵达桂林的文化人接受“邀请到重庆集中”^⑧，露出了一副惶遽相。

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周恩来同志对留在“腹地”和重返“腹地”的文艺工作者也先后作了妥善的安排。皖南事变后，进步电影的摄制陷于停顿，周恩来同志指示党的文艺工作者从“中制”、“中电”等单位动员一批力量转移到戏剧战线，和外地来渝的戏剧工作者组成新的演出团体，这就是1941年11月成立的“中华剧艺社”。1942年底，

周恩来同志又指示成立了以于伶、金山、宋之的等同志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剧社的成立，壮大了进步戏剧的力量。当第三厅被国民党强行改组时，周恩来同志作了强烈的抗议，迫使国民党成立了仍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作为合法的机构，保存着相当的实力，除原第三厅的主要人员而外，还聘请了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如茅盾、老舍、陶行之、马宗融等为兼任委员。它挂的是国民党的牌子，做的是“我们的工作”，张治中称之为“租界”。“文工会”创刊了《七天文艺》，组织了文艺演讲会、诗歌朗诵会、地方戏剧会演等活动，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当时更为主要的是，在“文工会”已不可能展开大规模活动的情况下，“文工会”成员遵循周恩来同志的嘱咐，加强了学习和学术研究工作。周恩来同志一再指示他们“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为革命加紧充实自己”。在1941年11月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我要说的话》中，周恩来同志特地结合郭沫若的斗争实际，高度评价了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强调指出，“这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现在郭先生似乎又清闲了”，周恩来同志殷切希望他“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的倡导下，“文工会”成员认真读书，从事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取得了很大成绩。郭沫若写下了百万字左右的“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和史剧，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杜国庠写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并与侯外庐等合撰了《中国思想通史》。其他同志也在学术上取得了成果。

由于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文协”这一时期在各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分会，它的成员几乎掌握了国统区主要的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并广泛地开展了活动。1943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祝文协成立五周年》说：“‘文协’的健在与健斗，表征了我们抗战文艺的发皇与战时文艺力量的发展与扩大。”

在巩固和扩大文艺统一战线同时，为牢固占领文艺阵地，推动文艺与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周恩来同志也作了大量工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作家们从抗战初期那种以为抗战一起来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兴奋状态中醒悟过来。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促使他们对抗战与民主斗争的联系有了愈益深切的理解，在创作中开始揭露那些“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僚，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这是创作活动的一大发展。1939年周恩来同志为著名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要求文艺“为抗战”服务，“为大众”服务，成为民族和大众的呼声。而这，就不能不反映以大众为主体的抗战现实，不能不揭露阻碍人民实现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的倒退、反动势力。当时，创作的主题多是抗日救亡、反对汉奸一类，触及国民党破坏抗战、搞法西斯统治的作品很少，因此，当1940年宋之的的《雾重庆》上演后，周恩来同志及时肯定了它的创作方向，指出了揭露、批判倒退、反动势力的重要意义。周恩来同志的题词和对《雾重庆》的肯定，从创作实践上为坚持抗战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绝大多数作家正是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努力前进的。

抗战文艺的进步和发展，“必须以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为基本条件”。为打破对进步思想、言论、出版方面的压迫和限制，周恩来同志根据当时话剧界进步力量比较雄厚和话剧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也易于结合现实斗争的特点，决定利用话剧作为击败国民党高压政策的突破口，让它首先占领国民党控制下的舞台。1941年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而开展的《棠棣之花》的演出活动，其动员之广泛，就显示了文艺界团结战斗的力量；1942年《屈原》的上演，更把话剧运动推向了高潮。

周恩来同志对《屈原》的创作和演出十分关心。当他了解到郭沫若创作《屈原》的意图，便极表赞成，亲自同郭沫若讨论剧本创作中的问题，肯定了这个戏的积极意义。全剧写成后，又兴致勃勃地聆听郭沫若朗诵，其后又大力支持演出。他反复阅读剧本，观看彩排，向演员讲解演出的政治意义，要他们“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⑧。演出之后，又亲自组织和修改评介这个戏的文章，宣传演出的成功和意义。《屈原》借古讽今，矛头直指独夫民贼蒋介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屈原》演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精神，有力地促进了抗战文艺的向前发展。

三

1944年以后，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不断取得胜利，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却在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新进攻下，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国民党还进一步强化其法西斯专制统治，官僚垄断资本的经济掠夺也更为残酷，使国统区广大人民和文艺工作者在精神上备受折磨。茅盾曾愤怒指出，“创作不自由，在一个作家就是精神的桎梏和压迫。”老舍也控诉道，“在肉体的病痛之外，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我必须象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⑨在物质生活上也极为困苦。1944年7月，“文协”发动“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就向社会倾吐了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仍然坚持斗争，站到了蓬勃开展的民主运动前列。

周恩来同志对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的文化、文艺人士十分关切。1944年12月，日寇侵入贵州，重庆震动，不少文艺工作者愤慨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又有着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徬徨苦闷。周恩来同志就尽量挤出时间，给他们分析形势，指出前景。巴金就有这样的感受：“他的态度恳切，话语明确，通过一个晚上的交谈，他把他那坚定的信心传染给我们了。”^⑩周恩来同志能给人以坚定的信念，能给人以力量，这是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所共有的感受。1944年11月11日他从延安来到重庆的当天，参加了郭沫若为欢迎柳亚子来渝的晚宴，宴会上他的一席话就使大家“顿觉蜗庐海样宽”。1944年11月和1945年1月他两度来重庆，都特地带来延安的粗呢、红枣和小米，分送给文化、文艺界

人士。送给徐悲鸿的一份，还特地请郭沫若亲自送到江北磐溪徐悲鸿家中。当王鲁彦因贫病在桂林逝世，他立即托冯雪峰寄送抚恤费；当骆宾基、丰村被捕，他立即请郭沫若予以披露，并设法营救。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一切，使文艺工作者深切地感到了党的温暖和鼓舞。

周恩来同志对国统区文化、文艺界人士投身于民主运动的洪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他说：“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⑩正是在周恩来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引下，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老舍、柳亚子、徐悲鸿、冯雪峰等三百余人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对时局进言》，提出必须及早实行民主，召开各党派紧急国是会议，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恢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证人身自由等六点意见。接着，昆明文化界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成都文化界发表《对时局献言》，把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对时局进言》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潘公展、张道藩等为此倾巢出动，进行破坏；他们另拟一篇反动宣言，胁迫各大学校长、教授签名发表，费巩教授就因拒绝签名而“失踪”。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于3月30日悍然下令解散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联系当时形势对此作了分析，认为当时形势与“文工会”建立的1940年已迥然不同，没有必要为维系“文工会”再向蒋介石提出警告和争取，但要揭露其反对民主运动和迫害进步文化界的罪行。在4月1日“文工会”举行的纪念晚会上，郭沫若写了“始于今日，终于今日，憎恨法西斯，勿忘今日”的题词；在4月8日各民主党派和文化界欢宴郭沫若和“文工会”成员的大会上，郭沫若坚决表示，“文工会”解散了，“我仍要做一个民主、文化、文艺的小兵”。两次大会都成了声讨国民党罪行的大会。5月4日，为纪念“文协”成立七周年和第一届文艺节，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文艺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以要求民主为中心内容的庆祝活动。这不仅宣告了文艺运动和人民的民主斗争的紧密结合，也宣告了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分裂文艺统一战线阴谋的破产。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发表以后，周恩来同志为贯彻《讲话》精神，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做了重大努力。

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新华日报》或转载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同志撰写的文章，或报导中央有关部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会议的消息，或发表社论阐释《讲话》精神，或摘要刊登《讲话》内容，直到最后以《文艺问题》为题，机敏地闯过了国民党的检查机关，全文发表了《讲话》。这样，《讲话》便传遍了国统区的整个文艺界。

张颖在《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一文中写道：《讲话》发表以后，“在曾家岩五十号临着嘉陵江的小屋，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小楼上，朋友们常常聚会，学习讨

论，周恩来同志不管是偶然遇到或事先知道，他都很关心，那怕是很繁忙或者是在两次会之间的几十分钟，周恩来同志都要和大家一起学习，谈一谈，给大家鼓舞”。周恩来同志经常以延安及其它根据地文艺界“一日千里”的变化，恳切告诫大家，要认真体会《讲话》精神，向延安和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学习。

此外，他还向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积极介绍延安文艺界实践《讲话》的成果。《讲话》正式发表不久，周恩来同志指示党的有关部门把延安的歌曲、木刻设法带到国统区发表或展出。1945年春节，周恩来同志特地组织随行来的同志在《新华日报》社的广场上举办秧歌剧晚会，演出《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等，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与会者都“从心的深处激起一种新鲜、活泼、而又亲切的共鸣”，受到很大启示。

为了深入开展《讲话》精神的学习，周恩来同志选派了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何其芳、刘白羽到国统区向进步文艺界传达《讲话》精神。1945年11月，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在重庆召开了以整风为内容的文艺座谈会。他建议文艺界的同志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展开相互间的批评、检查和改进工作。与会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周恩来同志的启示下，联系实际，对一些不良倾向和模糊阶级界限的作品进行了批评。

在学习《讲话》和文艺整风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了“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①的原则，因而取得较大的成绩。文艺工作者们遵循《讲话》中“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的指示，以杂文、讽刺诗、漫画等形式，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和切中肯綮的鞭答。1944年3月，夏衍等同志提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力图使文艺与人民群众进一步结合。1945年5月，“文协”在《纪念文艺节公启》中强调指出：文艺是人民的心灵的声音，是人民的事业，文艺节的纪念应该放在人民争取民主生活的伟大斗争目标上面，特别着重在和人民的解放要求的结合这一点上。1946年5月，“文协”在《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中更明确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这一切表明，国统区文艺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通过《讲话》的学习、实践，已经“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②。

※

※

※

周恩来同志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贯穿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全过程和它的各个方面。这里，我们提供的只是简单的速写，不仅极为粗略，而且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触及，例如周恩来同志在文艺思想、理论方面对马克思文论的发展。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对现实主义、文艺批评等问题的许多重要意见，在今天仍保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希望当年在国统区致力于抗战文艺的前辈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们批评指正。

① 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辑）

- ②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③ 参见《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新华日报》1938年3月28日）《划时代的盛会》（罗荪：《救亡日报》1938年4月8至10日）
- ④ 茅盾：《为诗人们打气》
- ⑤ 周恩来：《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
- ⑥ 李凌：《忆周总理和新音乐运动的二、三事》
- ⑦ 潘公展：《一年来的文化运动》
- ⑧ 转引自《大后方民主运动消息》
- ⑨ 张颖：《雾重庆的文艺斗争》
- ⑩ 老舍：《病》（1944年4月16日《大公报》）
- ⑪ 巴金：《望着总理遗像》
- ⑫⑬ 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
- ⑭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

“文协”成立时郭沫若、老舍和冯玉祥的题词和献诗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文协”在汉口成立，郭沫若、老舍和“丘八诗人”冯玉祥等或题词或献诗，对这个“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前一日，即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战线》第二卷第一期出版特辑，刊载了他们的题词和诗。现照录于下：

（一）郭沫若同志题词

统一文艺战线 巩固精神国防

（二）老舍同志献诗

三月鶯花黄鹤楼，骚人无复旧风流；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凯歌明日春潮急，洗笔携来东海头！

（三）冯玉祥将军献诗

有飞机，有大炮，各种机械化，武装真正好；真正好，还不成，若是没人使，武器有何用？
有人使，方才行，人须很健壮，活泼没有病；没有病，还不算，更须精神好，方能向前干。
有些人，只吃饭，认识既不足，精神不饱满；只重外，不重内，行尸和走肉，衣架饭袋队。
这种事，要快办，前方和后方，急需精神饭；那部队，精神好，奋勇又坚强，击敌没处跑。
有同胞，认识够，出钱又出力，热心把国救；为精神，办兵站，全国文艺家，联合起来干！
写小说，写诗歌，各样好文章，努力写的多；总原则，总计划，大家细商量，整齐我步伐。
步伐齐，各尽力，前方和后方，精神不受饥；不受饥，齐奋起，四万五千万，一致抗到底。
抗到底，定全胜，民族得解放，世界得和平。